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SELECTED WORKS OF THE CHINA
NATIONAL FUND FOR SOCIAL SCIENCES

中国道教思想史

(第四卷)

主 编 卿希泰 副主编 詹石窗

 人 民 出 版 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果文库

SELECTED WORKS OF THE CHINA
NATIONAL FUND FOR SOCIAL SCIENCES

中国道教思想史

(第四卷)

 人民教育出版社

组稿编辑:方国根
责任编辑:洪 琼 方国根
装帧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道教思想史(第四卷)/卿希泰主编 詹石窗副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ISBN 978-7-01-008210-3

I. 中… II. 卿… III. 道教史:思想史-中国 IV. B9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2030 号

中国道教思想史

ZHONGGUO DAOJIAO SIXIANG SHI

(第四卷)

主编 卿希泰 副主编 詹石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4.5

字数:545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01-008210-3 定价:84.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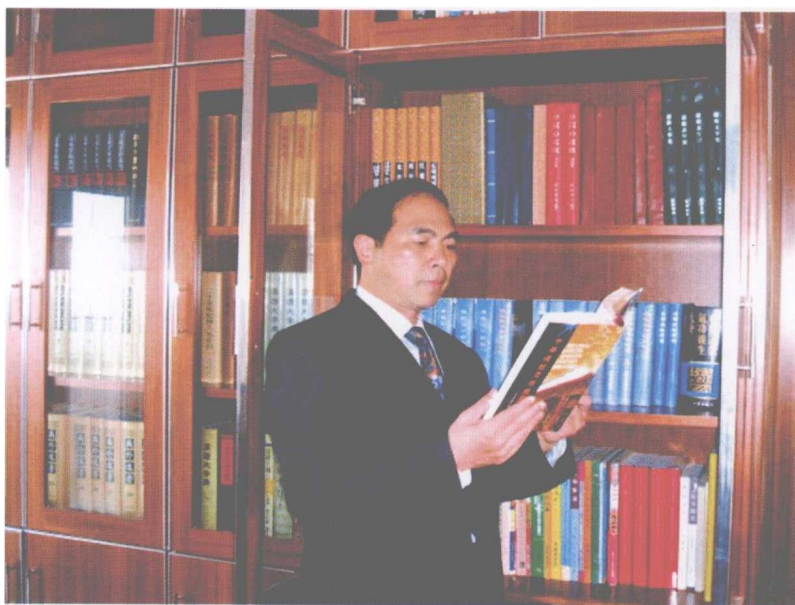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主 编 简 介

卿希泰 男，1928年生，四川省三台县人。先后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本科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曾任四川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副教授，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科规划评审组副组长、首届全国高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现任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首席专家，四川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宗教学研究》、《儒道释博士论丛》和《宗教与社会丛书》主编。先后编著出版《中国道教思想史纲》、《中国道教史》、《中国道教》、《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外宗教概论》、《道教文化新探》、《道教文化与现代生活》等各类学术著作700余万字，并荣获国家级和部省级优秀科研成果奖13次，其中一等奖6次、二等奖5次。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副 主 编 简 介

詹石窗 男，1954年生，福建省厦门市人。1982年获厦门大学哲学学士，1986年获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哲学硕士，1996年获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哲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院长，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专家，中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先后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道学精华集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百年道教研究与创新工程”等10多个课题。主要著作有《道教文学史》《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等20余部，组织编纂《国学新知文库》等多系列大型学术丛书，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个人著作先后获得省部级奖10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项，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项。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代表国家社科研究的最高水平。为集中展示这些优秀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编辑出版《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文库》将按照“高质量的成果、高水平的编辑、高标准的印刷”和“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统一封面设计”的总体要求陆续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5年6月

《中国道教思想史》

写作组

主 编 卿希泰

副 主 编 詹石窗

第四卷撰稿人 (以姓氏笔画为序)

尹志华	刘 宁	刘 恒	江 峰	张泽洪
张晓粉	张桥贵	陈耀庭	周 冶	苟 波
姜守诚	唐大潮	卿希泰	郭 武	常大群
黄永锋	阙丽美	詹石窗		

凡 例

一、本书凡引先秦诸子百家古籍，其出处仅注书名与篇名，如《论语·述而》、《尚书·洪范》。凡引两汉以来文集，若其书名中已经出现作者名者则其前不再加注作者名。

二、本书使用的《道藏》系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年版本，个别引文根据《四库全书》参校。《藏外道书》系巴蜀书社1994年影印本。《四库全书》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本。佛教《大正新修大藏经》系台湾“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影印版，引用时简称为《大正藏》。此数部大丛书在第一次引用时详细注明版本信息，从第二次引用开始则只注明丛书名以及册数、页码。

三、凡引述古本影印书，先列作者、书名、卷数，再列丛书册数及页码；若其古本书名已经在行文中出现，则仅注其丛书册数、页码。

四、本书所引《二十五史》，均略其作者名，仅注书名、卷数及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册数、页码。其余古籍，凡作者可考者则注明之。

五、本书凡引当今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在引用时一律注明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与册数或卷数、页码；凡出版社名称包含地名者不再另外注地名。

六、地方志依学术界惯例，直接在其前冠以刊刻年代，如“嘉庆《惠安县志》”等。家谱、族谱，凡地域可考者，乃冠其前，如“庐峰《蔡氏族谱》”，其刊刻年代刊刻者则列之于后，如“顺昌《谢氏宗谱·霞标公轮流收办祭簿记》，道光三十年撰”。

七、本书之行文，凡涉及年号等传统干支纪年，在其后加上公元年作为说明，如“太和丁未”（227年）；若属于公元前者，则在其前加上“前”字，如汉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至于人物生卒年，一般也在其人名之后加括号说明之，括号内的阿拉伯数字即是其出生或者去世之年。

目 录

第五编 明代末叶以来的道教思想

引 言	(3)
第三十三章 全真龙门派的内丹性命学和三教合一思想	(8)
第一节 伍柳仙宗的修道理论及其对三教关系的解释	(8)
第二节 王常月的《龙门心法》、《初真戒说》	(22)
第三节 张清夜《阴符发秘》、《玄门戒白》的思想发挥	(37)
第四节 刘一明与《道书十二种》对修道理论的阐扬	(45)
第五节 闵一得与《古书隐楼藏书》的全道说	(69)
第三十四章 东、西、中派的丹功理论及其特色	(82)
第一节 陆西星对内丹双修理论的贡献	(82)
第二节 傅金铨“阴阳双修”的内丹理念	(92)
第三节 李西月的内丹思想及其特色	(107)
第四节 黄裳的内丹理论与儒道融通思想	(120)
第三十五章 明代末叶至民国道教劝善书的思想变迁	(138)
第一节 道教劝善书的流传与兴盛	(138)
第二节 道教劝善书流传与兴盛的形式内容	(152)

第三十六章 民国以来的道教思想及其研究成果	(174)
第一节 陈撷宁的仙学思想	(175)
第二节 易心莹的教理思想	(182)
第三节 现代学者对道教经典的整理与思想研究	(193)
第四节 陈莲笙的弘道思想及其理论推动作用	(215)
第五节 “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探讨	(233)

第六编 道教思想的历史影响与现代价值

引 言	(261)
第三十七章 道教思想的历史影响	(265)
第一节 道教思想对民间结社宗教的影响	(265)
第二节 道教思想对少数民族宗教的影响	(284)
第三节 从明清小说看道教思想的社会影响	(300)
第三十八章 道教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再认识	(315)
第一节 道教哲学的基本建树、特征与作用	(315)
第二节 道教伦理思想的要旨及其现实意义	(339)
第三节 道教医学的法脉、历史地位及其未来发展	(357)
第四节 道教养生精神与生命自我超越	(374)
第五节 道教文学及其思想蕴涵的综合审视	(395)
第六节 道教艺术的主要形态与审美情趣	(412)
主要参考文献	(435)
附录：百年来道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501)
后 记	(541)

第五编

明代末叶以来的道教思想

引 言

明代中叶，在中国道教发展史上是一个分水岭。之所以称之为“分水岭”，是因为此前此后道教的社会地位与思想文化建设出现了明显差别。如果说明代中叶以前道教从总体上看是处于发展的上升期，那么，明代中叶以后道教就逐渐进入了衰落期。

道教衰落，存在着复杂的原因。从政治角度看，这与皇室的政策具有直接的关系。相比而言，明代中叶以后，皇室对道教的支持力度比起先前来降低了，而对其管束却大大加强了。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作为道教正一派传承象征的“正一天师”的地位显示了下降趋势。根据《明穆宗实录》等文献记载，隆庆元年（1567年），时为第四十九代天师的张永绪被中止了世袭的“天师”号，隆庆二年（1568年）甚至连“正一真人”号也被剥夺了。^① 这种情况的发生，既有张永绪本人自己的原因，也有朝廷方面的原因，但无论如何都说明，从穆宗开始，明代皇室对道教的态度是有所改变的。到了万历五年（1577年），张国祥请求恢复“正一真人”号，这件事是费了许多周折才办成的。虽然办成了，但却失去了往昔先辈形成的朝觐权利。^② 明神宗时期，张天师虽然有朝觐的机会，但实际上并不受重视。熹宗、思宗统治时期，明王朝已经摇摇欲坠，统治者其实是无暇顾及道教与朝政的关系了。

^① 参见《明穆宗实录》卷7，《明实录》，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49册，第215—216、434—435页。

^② 参见《明神宗实录》卷60，《明实录》，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52册，第1368页。

当清朝政府代替明王朝统治的时候，道教的地位虽然有所变化，但总的说来却是受到削弱，其根本原因是清朝统治者本来就信奉萨满教，入关之后主要信奉佛教，对于道教虽然在表面上尚给予尊重，但在实际上却有许多限制。从清顺治皇帝，到康熙、雍正皇帝，都采取了抑制道教的政策。尽管在顺治三年（1646年）还曾经有过敕封张应京为“正一嗣教大真人”的举措，但在后来的诏书中却罗列许多限定性的条件，比如说宣称“务使异端方术，不得惑乱愚民”^①，这篇诏书反映了当时朝廷对道教信仰者复杂情况的严重担忧。康熙皇帝甚至直言不讳地批判道教的神仙之说。在他心目中，道教已经“流而成弊，刑名放荡”^②，所以应该予以管束。经过了数十年之后，雍正皇帝重新认识到道教的社会作用，他提出儒、释、道三教立宗不同，但就佛与道来讲，其主旨在于“劝人为善，戒人为恶”，因此于世有补，不可废弃。基于这样的认识，道教中的一些领袖人物还是受到器重的。然而，好景不长，自乾隆皇帝开始，道教首领的地位就一再下降，道教活动受到更多的限制。一方面，限制道教的传播范围，例如禁止正一真人派员往各省开坛传度，只能在龙虎山一带发展组织，倘若违反就将“法办”治罪，真人也要予以议处^③；另一方面，再度降低正一真人的品位。乾隆十二年（1747年），正一真人的教阶由二品降为五品，后来虽然在品位上有所变动，但总的趋势是逐步被边缘化、地方化，这种情况到了嘉庆、道光时期更加明显。朝廷通过种种措施严格控制道教组织的发展，正一真人在客观上已经成为朝廷管束道教的代理人，没有什么自主权了。到了鸦片战争前19年，即道光元年（1821年），清朝政府敕令重申禁止张天师的朝觐活动，而且明确宣布其“不准来京”，道教在宫廷的政治舞台从此被拆除了。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受到了严重打击。此后，从咸丰（1851—1861年）到同治（1862—1874年）时期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拜上帝”运动，既给清朝政府的统治造成致命的打击，也让儒、释、道为

^① 《白云观志》卷7《补汉天师世家》，《藏外道书》，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影印本，第20册，第640页。

^② 《热河志》卷1《圣祖御制文·七询》，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本，第495册，第27页。

^③ 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8494页。

主体的传统文化受到挫伤，原有的三教神明在太平天国活动区域几乎都被当做邪神而不许祭祀崇拜，许多地方出现了焚毁神庙、偶像的事件。太平天国虽然无法真正摆脱传统的儒、释、道信仰的影响，但进口的“上帝”崇拜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破坏了原有的信仰秩序。

1911年的辛亥革命，宣告了维持数千年的封建君主统治制度的终结，在“三民主义”旗帜下，民国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道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得以合法存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中国知识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对于从意识形态上瓦解封建统治的精神基础、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普及科学知识来说都有正面的作用。然而，它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清算和否定在实际上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当时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都提出了致力于消除传统的诸多主张和口号，一些文化激进主义者甚至提出废除汉字的愚蠢主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道教被列入与科学信仰相对立的迷信范围，从而遭受猛烈抨击。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民国政府虽然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在信仰与迷信的界限上却一直含混不清，以至于道教在事实上还是被牵扯进迷信的大染缸之中，故而在活动场所上也发生问题，许多道教宫观被改为学校、庙产被征收以资助办学。

综上所述，从明代中叶以来一直到民国时期，政治背景对于道教的存在来说是不利的。因此，道教的衰落趋势也就难于阻挡了。一方面，道教的教团势力逐步失去了往昔的辉煌，明代中叶以前全真道那种金莲竞放的局面逐步收拢，唯有龙门派还比较活跃，至于正一派在上层社会的影响力由于朝廷的限制当然是越来越小了。另一方面，道教的思想文化创造力也受到限制，教理教义无法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作出新的调整，“因袭”成为这个历史时期道教教理教义说解的一种基本事实。

然而，必须指出，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形态，道教在明代中叶以来并非在思想上完全静止或者无任何建树。由于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道教虽然不受统治者欢迎，甚至有时还受到政治力量的压迫，但是民众中的信道者还是相当之多的，道教的天神、地祇在社会上还是拥有广大信仰空间的。各地的民俗文化节日，人们照样迎神赛会，热烈的气氛足以表明道教依然像绿草地一样覆盖在中华大地上。因此，仔细追溯一下，我们依然可以发

现这个时期道教思想文化还是为后人留下一些可以继承和发挥的内容。

在经典文献上，先有万历时期张国祥领衔编纂的《续道藏》，后有闵一得所著的《古书隐楼藏书》、傅金铨的《道书十七种》、晚清民国时期的《重刊道藏辑要》、《道藏精华录》等丛书的增补和行世。这些丛书虽然有许多已经见于《正统道藏》，但也收录了不少新的道书，例如《万历续道藏》所收的《高上玉皇本行经注》、《紫皇炼度玄科》、《吕祖志》等在思想史上都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根据诸多道经以及相关历史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明代中叶以来道教思想流迁所具有的三大特征：

第一，运用三教理论来讲述内丹操作规程。由于实修的推动，明代中叶以来，道教越来越偏重于内丹的操作，这个时期比较有影响的道教学者基本上都关注内丹理论与实践，并且都有这方面的著述，无论是作为全真龙门派的伍柳仙宗，还是归属正一派的娄近垣、归属净明道的傅金铨，无论是著述等身的陆西星，还是偶有著述的一些不太知名的道士，从他们留下来的各种文献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内丹学所具有的突出地位。而当我们再深入一层分析的时候，还会看到此时的内丹学著述往往又和“三教”理论相贯通。换一句话来说，此时的道士们并非是单纯地讲述三教义理，他们引述三教经典，其实是为论证内丹实修服务的；反过来看，那些以内丹相标榜的著作往往兼容三教思想，从而使内丹的技术操作与道教哲学比较密切地结合起来。

第二，在上层社会相对冷落道教的时候，民间下层却把道教作为自己的精神故乡。于是，道教与民间宗教信仰的融通便成为明代中叶以来发展的一种趋势。一方面，道教的经典的解读趋于通俗化，道教善书在民间社会更加流行起来，许多神明既是民间信仰的主神，也在道教神仙体系中拥有一定的地位。顺应这种潮流，一些以民间俗神为崇拜对象的经典得到道教的认可，并且进入道教的丛书之中，例如有关妈祖信仰的文献、徐仙信仰的文献等，本来主要是地方民间庙堂的典籍，后来却被收入道教的一些丛书之中。此类著作虽然更多地是描述崇拜的科仪程序，但也包含着一些比较独特的思想，故而也是值得研究的。另一方面，我们考察明末以来流布的许多民间宗教，例如三一教、黄天教、红阳教、真空教、一炷香教、黄崖教等，可以发现道教思想深深地渗入其宝卷经籍之中。因此，我们研究这个历史时期的道教思